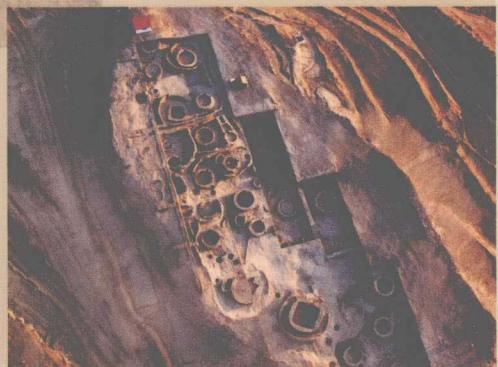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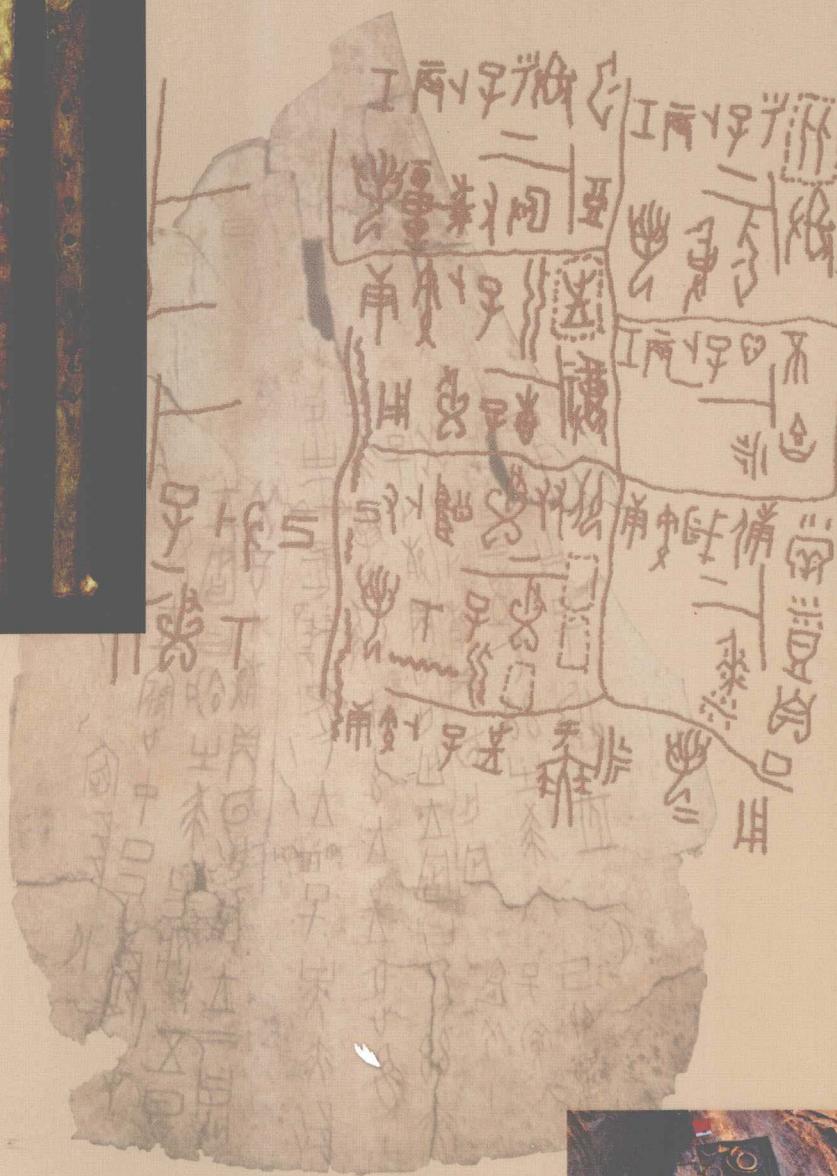


中国模式 解读早期中国



卜工◎著

科学出版社

中国模式解读早期中国

卜工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在《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理念指导下研究和探索早期中国历史的尝试。认为中国古代历史应分为前期中国、早期中国、古代中国和近现代中国四个阶段。其中，早期中国是特殊的历史阶段，因为，礼制的发生、发展与成熟、完善在此留下了浓墨重彩；多层次的联盟制度和政治艺术的萌芽和成长在此构筑出斑斑史迹；有所发明的经济生活和殚精竭虑的筑梦天下在此积累有丰富的考古资料。所以，早期中国无疑应该作为独立的历史阶段研究，应该作为世界历史中的独特类型研究，应该作为中国特色的起点进行历史深度研究。舍此，便没有办法正确认识古代中国乃至后来中国的走向及其历史的必然性。

本书适合于希冀了解早期中国历史的广大人士。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模式解读早期中国 / 卜工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8

ISBN 978-7-03-031997-5

I. ①中… II. ①卜… III. ①礼节 - 制度 - 研究 - 中国 - 古代

IV. ①K8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 158772 号

责任编辑：宋小军 / 责任校对：李 影

责任印制：赵德静 / 封面设计：黄华斌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 政 编 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 国 科 学 院 印 刷 厂 印 刷

科 学 出 版 社 发 行 各 地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

2011 年 8 月第 一 版 开本：B5 (720×1000)

2011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6 插页：8

印数：1—3 000 字数：304 000

定 价：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前　　言

继《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和《历史选择中国模式》之后，《中国模式解读早期中国》将要与读者见面了（以下分别简称为《模式》、《选择》和《解读》，三者合称“中国模式”）。如果说前两者是姊妹篇的话，那么后者的加入，无疑就形成了文明起源中国模式的三部曲。

《模式》主要讲什么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特点，强调中国曾经拥有个古礼的时代，礼制的发生、发展与成熟、完善是中国古代的独特经历，是中华文明的核心特色，是中国文明起源的基本脉络，更是中国创造的起点，对人类社会伟大贡献的发端，早期中国真的不是传说。

《选择》讲为什么中国古代能够拥有此特点，揭示中国古代的礼制存在着上中下游，周礼不过只是其中游，礼制的源头在古礼时代，中国礼制发达的真正原因在于以家族组织为基础的、有特色多层次的联盟制度。

《解读》则根据考古学资料分析了早期中国具有怎样的内容与特征，试图勾勒早期中国的历史轮廓，换言之，要“掀起她的盖头来”。

“三部曲”的出发点在于中国特色。在早期中国的研究探索方面，初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框架或是体系，基本的格局业已框定。但是，最后完成的《解读》在写法上却也考虑再三。因为用考古学资料写史，在没有文献与文字支持的条件下，也就是在缺乏铁证的

情况时，是像以往那样将早期中国的历史写成物质文化的发展史、还是社会历史的发展史，就成为必须作出选择的课题。物质文化史要写，但不是终极目标。因为，人们都熟知物质第一性的原理，社会历史发展史是以物质文化为前提和依托的，背离这个原理当然不可能对社会发展规律获得真知灼见；然而，物质文化的发展史并不完全等同于社会发展史，历史还包含着极其丰富的非物质文化的因素，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其作用和意义又具有难以估量的特殊性，与物质文化和生产力不同，它不表现和指示水平，而在体现和规定性质方面发生作用。所以，仅仅通过物质文化的描述是不能全面认识当时社会发展状况的。也就是说，物质文化发展史不可以代替社会发展史的研究，人们的认识不能永远停留在物质文化史的阶段。

有鉴于此，《解读》略去了对那些精彩绝伦的、叹为观止的、惊世骇俗的中国考古学重大发现的相关描述，而着眼于对物质文化中制度建设的线索作深度发掘，追寻它们在历史长河中的连续性及其意义，目的就是要将早期中国作为历史或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认识，所以，在写作的方法与方式上进行了斟酌。

首先是尽量避免过多的描述，而直奔主题。

其次是尽量不重复《模式》和《选择》中的论证，虽然材料相同但角度却有区别，以免读者产生“江郎才尽”的感慨。

再次突出过去不被注意但又是能够反映社会综合能力的关键问题。例如，殚精竭虑的筑梦天下等。着眼于体系建设大的环节和主要方面，为《模式》、《选择》和《解读》融为一体作必要的铺垫。

严格地讲，“三部曲”还不能充分地表达“中国模式”的全部思想，而只是能够表达其基本思想。因为，“中国

模式”是一个发展的概念，随着中国考古学实践的发展其内容必然更加充实和丰富。但是，值得庆幸的是这个体系毕竟已经粗具规模了。同时，“中国模式”也并不能完全说明中国古代社会各个方面的情况，因为它主要是说明中国文明起源的特点，用礼制的发生、发展与成熟、完善概括只是提纲挈领，而非替代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史。这个道理原本是极其简单的，可是被曲解的情况常常发生。

“中国模式”的体系能够提供的历史线索应该有：

- 第一，中国古史应该进行怎样的分期研究；
- 第二，古代中国的文明究竟拥有怎样的特点；
- 第三，早期中国的社会基础与内容何在；
- 第四，上述特征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地位、作用及其意义何在。

由于早期中国地位的确定，前期中国的年代界限就显得清晰多了。自人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以来，到近代之前，主要经历了前期中国、早期中国和古代中国三个大的发展阶段。过去的研究经常使用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等概念既不严密也不准确，更不科学。因为，那时的原始社会中含有前期中国和早期中国两个阶段，而奴隶社会中又包括了早期中国的部分阶段，完全不能真实地反映中国历史的客观实际，反倒造成了矛盾重重争议颇多的研究窘境。现在当学术界逐渐地认识到这些问题的症结以后，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历史阶段划分的方法便不断涌现出来。本书的认识应该属于其中之一。

前期中国，即人猿相揖别之后到早期中国以前。这是真正意义的人类童年时期，岁月蹉跎且艰苦漫长。

接下来的第二阶段是早期中国，其年代范围大致在距今万年到西周时期以前，是中国古礼的发轫时期，培育和规定了古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

第三个阶段是古代中国，大约从西周时期到辛亥

前 言

革命以前，以往的研究多称之为封建社会。

此后，才是近代中国与现代中国。

礼制的发生、发展与成熟、完善是中国古代文明和早期中国根本性特征的认识，将中华文明近万年的历史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是中国思想、中国文化、中国知识、中国传统的根基之所在，魂魄之所系。

多层次的家族组织是当时社会基本细胞，有特色的联盟制度，是最基本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基础。让这些认识，率先走出了理论的禁区和研究的误区，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历史基因，以及诸多历史上重大事件的成因与由来。

有所发明的经济生活和殚精竭虑的筑梦天下讲述的是社会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和控制能力，是从综合实力方面讲人类社会的进步，揭示运动中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水平。

早期中国只是历史的瞬间，是一个时空框架，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概念。

中国是一个神奇的国度，底蕴深厚，传统悠久。古代乃至于近代社会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都似乎是历史的回声，都会令人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都会使人感叹惊人的相似之处。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基因却定然发挥作用。所以，科学与成功的研究无疑必须能够阐释和回答历史的必然性，必须能够在多样性的世界中提炼和认识中国自身的特色。

当前，在研究队伍貌似壮大，著书立说者甚众，学术刊物不断增厚，腐败之风有增无减的学术界，又有谁人能够独立潮头，用科学的思想体系检讨以往的研究和开创新的局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曾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这著名的佳句是笔者坚信和坚持的基本理念，并以此作为前言的结束之语。

目 录

前言 i

上篇 早期中国的界说与研究

第一章	早期中国不是个传说	3
第二章	中国考古学的新发展	18
第三章	中国模式的基本思想	36
第四章	文化传承的主要渠道	42

中篇 早期中国的内容与特征

第五章	有所发明的经济生活	87
第六章	殚精竭虑的筑梦天下	121
第七章	浸透社会的礼仪传统	137
第八章	谋求发展的联盟制度	159

下篇 早期中国与中国史观

第九章	近代史学的主流认识	191
第十章	实践撬动误区的闸门	196
第十一章	中国古史的阶段划分	207
第十二章	特色体系的研究要求	216
第十三章	早期中国的理论启迪	236

后记 243

上篇

早期中国的界说与研究



亲爱的读者，如果您尚未读过《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图一）和《历史选择中国模式》（图二），那定然不知道在遥远的万年以来到西周以前，中国曾经有个古礼的时代，可能还以为那是个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不知道构筑社会的基本细胞是家族组织，还以为那是个图腾飘扬、氏族林立的血缘关系支撑的简单社会；不知道家族联盟是当时主要的社会政治制度，还以为一盘散沙，各自为政可以概括当时的社会关系。



图一 《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封面 图二 《历史选择中国模式》封面

这个被文献遗忘的、几乎无人知晓的时代却正是酝酿《周礼》和周代政治制度的妊娠时期。笔者称之为古礼的时代，这个时代不仅是中国礼制的真正源头和上游，也是早期中国闯入人类世界的历史瞬间。那个时期重大事件和社会生活所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使得现在的人们能够窥见他那朦胧但依然伟岸的身影，区分支撑锦绣中国历史画卷的经纬结构，抽象生活习俗中凝固的约定与制度，确定当时人类的综合能力和发展水平，再现早期中国无与伦比的灿烂辉煌。

上述认识本书将多次提及，反复强调，实在是因为对于正确了解中国古代社会太为重要了，舍此，当无它途。

第一章 早期中国不是个传说

第一节 必要的界说

因为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特别强调概念明确是讨论和研究问题的前提与基础，所以本书当然不能破例。

关于早期中国的概念，学术界历来是存有不同认识与说法的。早期中国究竟能有多早？对大多数人讲可能还是个新问题。

生活在现代中国土地上的远古人类，例如北京周口店的猿人虽然可能是现代中国人的先祖，但那个时代显然与中国的概念没有关系，是真正意义的蒙昧时代、原始社会，自然与早期中国无缘。

这样的认识逻辑可能会使很多人产生联想及推演出相关的道理：

第一，中国两字作为国家概念的使用必然是认识早期中国的关键；

第二，中国是中华民族之国家，中华民族的形成肯定与早期中国有关。

于是，早期中国的研究就面临着被复杂化和扩大化的倾向。其实，早期中国仅仅是指历史文献朦胧记忆的年代和当今中国的地域范围，简言之，早期中国实际上只是某个时空框架内的特定内容，此外，没有任何别的特殊意义。中华民族的形成也是后来的话题。但是，由于早期中国的许多地区又存在着世界性研究视野中早期国家的某些特征，因此，对早期中国与中国的早期国家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概

念还是要做些说明的。

早期国家是学术界研究人类早期政治组织形式的重要概念，是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共同关注的世界性课题。

什么是早期国家？目前学术界尚无统一的认识。所以一些国外学者在谈到现代早期国家研究所面临的障碍或困难时，首先指出的一条就是：“根本不存在为整个学术界所公认的国家定义。”他们解释说：“几乎每位学者都会提出他自己的国家定义，这些定义不可避免地会同已有定义有细微的差别，虽然其中有些由于有相似的方法而可以



图三 《中国早期国家》封面

被认为是组成了一些学派。因此，要达到一种综合事实上是不可能的。”^①（图三）研究者进一步指出，对上述评论必须补充两点意见：

“第一，没有公认的定义不等于在对国家下定义方面学术界没有任何比较一致的理解。……第二，……他们的说法反映了比较专门化的研究的要求。……他们显然没有提到在一些一般的关于国家的思想中包含有某些被公认的内容。虽然在所谓一般的关于国家的思想同早期国家研究的专门化的要求之间有一定的距离，但由于它们同样涉及国家问题，所以在对早期国家的专门化的研究中是不应当完全不注意到这些一般的关于国家的思想的。事实上，关于早期国家的专门化研究在其形成过程中已经从一般的关于国家思想中吸收了许多建设性成果。”

“早期国家的定义的第一个要求是要把早期国家同一般国家区别开来。在这里，某个国家产

^①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

第一章

早期中国不是个传说

生时间的早晚不是实质性的。在绝对年代上，苏美尔国家的产生比阿兹特克国家的产生要早几乎五千年。但它们都可以被认为是早期国家。在这里实质性的问题是早期国家是直接从前国家社会演变而来。历史上有许多国家也出现在较早的时代，但是反而并不在早期国家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这些国家往往是当地国家制度发育了很长时期之后的产物，因而与早期国家形态有很大不同。总之，在学术上有必要从所有国家中区分出一种在发生上同原始社会有连续性关系的类型。而在研究中，往往特别地把这种类型的国家称为早期国家。”

“对于早期国家的定义的结构性内容的考虑，主要是针对早期国家与前国家社会的区别。从现代学者来看，这里主要包含以下几点内容：①早期国家拥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最高政治权力中心，或者称之为统治者或统治集团。……②早期国家拥有与其中央权力的实施相适应的行政管理和政治机构，包括官署（亦称官僚系统）、军队、监狱等。……③早期国家所处的社会是社会分层高度发展的社会。……④早期国家有针对某个固定地域实行统治的概念。……⑤早期国家有支持其合法统治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

上述认识无疑相当精辟，属于作者所言的专门化的研究。可是，对于主要依靠考古学资料认识的早期中国而言，这“五项要求”并非同时出现，而是在历史过程中陆续或相继出现的。就如同文明起源的研究一样，若用具有世界意义的文明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时候，总是令人感到阴差阳错而不能完全吻合。于是，问题便接踵而来。

第一，完全符合“五项要求”的早期国家应该是商王

朝建立的。因为甲骨文对“五项要求”有相应的记载，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更提供了铁证。可是，夏王朝建立的国家就与“五项要求”存在明显的差距。因为夏人的文字还有待发现。所以，50多年前，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姓“夏”还是姓“商”，学术界竟然讨论了很多年之久。原本在物质文化和历史文献的记载方面拥有承袭关系，连续发展，发达程度比较接近的两个王国如果按照“五项要求”的标准考察，势必被完全割裂开来。那么，“五项要求”的意义究竟何在呢？

第二，早期中国是依赖考古学资料说明的，而“五项要求”的很多专门化的内容是考古学难以阐释的。像第3项早期国家所处的社会是社会分层高度发展的社会，和第4项早期国家有支持其合法统治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考古学有一定能力加以说明，而另外三项显然无能为力。那么，“五项要求”的诸项孰轻孰重，是否存在主次之分呢？

第三，早期中国不是一个特定的国家的概念，但不是说早期中国的时期尚没有国家形态的存在。“五项要求”的认识“主要是针对早期国家与前国家社会的区别”，但比起本书关于“早期中国”与“前期中国”的相对模糊的界限要明确、严谨和规范。可是，如此一来，那些处于临界状态的早期国家就断然难以界定了。事实上，国家的萌芽与发生及其形成过程才是最重要的。

第四，中国的考古学资料表明，“国家意识形态”的发育存有漫长的历史过程，早期中国的礼制思想与精神便是本质上的“国家意识形态”，否认这个基本点，“国家意识形态”就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

古礼的发生与发展，成熟与完善影响、开化和制约着几乎是早期中国土地上的所有古老小国，这无疑是多如繁星的小国最终走上统一道路的思想基础。所以，对“国家意识形态”要具体分析，既不能笼统地认为所有小国的“国

家意识形态”都完全相同，也不能认为有多少小国就存有多少“国家意识形态”。

按照“中国模式”关于古礼存有两大系统多个类型的认识，早期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还是存有类型与大系之区别，这无疑反映出早期国家不论其数量有多少，但“国家意识形态”的基本格局是比较清楚的。所以，不必为黄帝时期天下万国的数量精准与否而费神，也不能将“国家意识形态”理解为某一特定国家的意识形态，这可能就是早期中国的重要特色。

第五，在早期国家的研究中，有氏族模式和酋邦模式两种意见的讨论与争辩。

由于“中国模式”认为，近万年以来的考古学资料不能提供早期中国有氏族组织的存在，她的发生与存在要到距今万年以前的时代去寻找和发掘，所以，本书不提倡氏族模式。

至于酋邦模式，其主要特点是，“有关社会在进入国家社会前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中央集权的权力，亦即社会最高权力在一定形式下被占据社会特殊地位的个人所掌握。……这种社会在现代人类学中往往被称为‘酋邦’”。

可是，在早期中国的许多地区，家族内部的继承制和联盟组织领导的推选与禅让制相得益彰的发展，在有特色、多层次的联盟制度的旗帜下，许多小国政治倾向明显，但又独立行事，在那里既无社会最高权力可言，国家的规模又相当有限，即便时代进入到周代以后，其状况依然不改，就像山西南部近年不断被发掘出来的小国一样，使用酋邦的概念难以全面反映其实际内容和状况。而且，早期中国的联盟制度也并非具有中央集权的意义，只是到了早期中国的晚期阶段，联盟组织领导的推选与禅让制度由于夏启导演的继承制而被终结之后，“社会最高权力在一定形式下被占据社会特殊地位的个人所掌握”才得以确立。

第一章

早期中国不是个传说

因此，酋邦的模式并不能说明早期中国的实际情况。

另外，“中国模式”不使用“部落联盟”的概念，因为“在摩尔根的著作中，部落联盟是在典型氏族一部落制度下出现的一种较高级的人类早期政治组织形式。也就是说，部落联盟理论从根本上说是关于典型氏族社会的理论”。既然氏族制度的发生与存在要到距今万年以前的前期中国所处的时代去寻找和发掘，那么，早期中国自然没有讨论这一问题的必要。

可是，家族组织及其联盟制度却是早期中国的重要特色。在中国古代，家族组织的规模有大有小，其支系有简单与复杂之分别，所以，有特色、多层次的联盟制度便因此而产生出来。

摩尔根在赞扬北美易洛魁的部落联盟时曾说道：“这个行动将垂光于史册，以纪念他们发展氏族制度的天才。由此可以看出，人类在处于低级野蛮社会时，尽管条件很差，却能在政治艺术方面完成多么伟大的成就，这一点也应永不忘怀”。

倘若，摩尔根对早期中国有特色、多层次的家族及其联盟制度有所了解，可能会给予更高的评价和更深邃的憧憬！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长河中，联合结盟的政治艺术被中国的先人发挥到极致，人们耳熟能详的“三家分晋”，“合纵连横”，三国时期魏蜀吴之间的关系，都能够说明联合结盟的政治艺术是中国智慧的重要内容。

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在世界外交舞台上的政治取向和外交策略，依然可见古老政治艺术的血脉和传统。而当今的世界正处在大国联盟和区域联盟新格局的时代，发掘和总结早期中国的历史经验无疑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有了上述认识，人们可以简单地了解到早期国家研究的重要性；也可以粗知早期中国具有一定的历史特殊性；还可以认识到早期中国与初期国家的阶段发生着某种联

第一章

早期中国不是个传说

系，所以，更增加了探求早期中国的具体情况和实际状态的渴望。

历史文献朦胧记忆的早期中国真是迷雾缭绕、神奇怪诞，语焉不详、支离破碎；但绝不是空穴来风、无中生有，胡说八道、毫无根据。那么，什么是早期中国？

本书对早期中国的定义可以概括为：考古学与先秦文献互证的、距今万年到西周以前的、发生于当今中国土地上的、考古学所能观察到的人类社会综合状况。

从年代上讲，早期中国大约是在距今 10000 ~ 3100 年的西周早期以前。传统的中国史学研究认为这个时期属于古史传说时代，许多人物和事件均不可考，其真实性曾经受到强烈的质疑。

按进化论思想指导研究，则是将这一过程一分为二，距今 4100 年以前为原始社会，其后以文献记载的夏代为阶级社会的开端，此说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流行的时间最长，影响最广，而且，始终占统治或是主导地位。

可是，这两种研究的结论却由于近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而最终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和回炉式的检验，在实事求是光谱的照耀下，它们的弊端无处可藏，其历史的局限性暴露无遗，被摒弃、被批判、被取代便成为势所必然的了，对此，后文将多次提及。

从内容上讲，早期中国存在于、根植于、见证于西周以前的考古学文化之中。因之，只有那些考古学文化的资料才是描绘早期中国基本面貌的客观依据，才是揭示早期中国根本特色的唯一抓手，才是阐释早期中国内在规律的基础所在。

由于两周时期的考古发现与此前的中国考古学资料息息相关，血脉相连，所以，无论从文化还是社会内容上都是难以与早期中国割舍的，因而本书不反对史学界常用的先秦时期的概念，只是强调这个概念应该是两周时期的特